

王充——古代的 战斗唯物论者

田 昌 五

王充——古代的战斗唯物论者

田 昌 五

人 民 出 版 社

王充——古代的战斗唯物论者

田 昌 五

*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5印张 110,000字

根据三联书店1958年8月第1版修订重排

1973年11月第2版 197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50,000

书号 11001·253 定价 0.36 元

前 言

读了王充的著作，我认为有对之加以总结的必要。这，一方面是想评价王充及其思想，另一方面是感到王充的思想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

王充是汉代反动统治阶级的封建正统思想的造反者，这就是他的伟大处。因此，他的一生备受压抑，他的学说也不见重于世。在他死后，历代的反动封建学者都对他横施污蔑和攻击。有的说汉代“文章”甚盛，但王充的著作却是由盛而衰的产物。有的说他的著作芜杂而不精，不足为训。有的甚至发为“诛心”之论，说他“诋訾孔子”，“厚辱其先”，乃“名教之罪人”，其著作自无可取之处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个别进步的资产阶级学者曾经注意到王充的无神论思想，并利用它来反对封建迷信，但对王充的思想缺乏全面的研究。解放前，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曾经给予王充的思想以应有的重视，并试图对王充的思想作出全面的评价，不过也没有完全如愿以偿。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中国人民早已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翻了身，掌握了政权。我们也应该让数千年来受尽压抑的王充翻过身来，并对他的学说给以科学的总结，恢复他在中国思想史上应有的地位。

王充对汉代正统的反动思想体系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批

判。这个反动思想体系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其神学性和宗法性。它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等揉合在一起，作为反动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这种反动思想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地占有支配地位。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谈到旧中国的传统的统治权力时，曾经提到“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几种权力压在农民身上几千年。它们在思想上的表现可以概括为一个公式：“天地君亲师”。随着中国两次大革命的胜利，中国社会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反动思想也随之土崩瓦解了。但，正象反动统治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一样，反动的思想体系也是不会自动消亡的。而且在反动统治阶级被打倒之后，其思想残余还往往要保留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肯定地说，上述反动思想的残余今天依然还有的，并阻碍着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地清除这种旧社会留下来的思想垃圾，直到它完全消灭为止。总结王充的思想，将有助于我们清除这些反动思想的残余。

这里发生一个问题：如何把高度的科学性和鲜明的战斗性在总结中有机地结合起来呢？对此，毛泽东同志早已给我们作了原则性的指示：“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①我们可以循着这个方向前进。但如何把它具体地贯彻在我们的总结中，仍是不无问题的。因为即使是古代最先进的思想家，他的学说也往往是精华与糟粕杂揉在一起的。要想在剔除糟粕时保留精华、在吸取精华时扬去糟粕，确非易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668页。

事。以王充为例，他的思想中，主流是唯物主义，但又和自然宿命论交结在一起。其中有的论点一方面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另一方面又具有唯心主义的因素。有的是唯物主义包着唯心主义，或者相反。有的问题作者是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提出的，但结果却岔上了唯心主义的路子。而且即使是唯物主义的东西，在现在看来也许还有问题。反之，即使是唯心主义的东西，在当时也可能有些政治上的积极意义。总之，情况是复杂的，这里不过是几个例子罢了。对这一切，必须遵照列宁的指示，“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①我们的总结应该是这些经过具体分析的具体材料的综合。在“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②的过程中，一方面应根据当时的社会条件历史地评价其得失，同时也要按照现代的科学水平指出其缺陷；一方面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将其阶级性充分显示出来，同时也要指出其阶级的局限性；从而把它固有的科学性与战斗性和我们的总结所应有的科学性与战斗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完成毛泽东同志向我们提出的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地总结我们的历史遗产的任务。

必须说明，个人不是什么专家，要完成这一任务，自然格外困难。文中错误当所难免，尚望同志们慨然教正。

本文写成于1956年4月，在最后修改时曾参看了一些有关的近人著作。其间见仁见智，互有异同。不敢掠美，附此声明。

在本文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曾得到一些朋友的帮助与

① 《共产主义》，《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0页。

②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757页。

鼓励，特别是三联书店编辑部的同志们对我帮助很大。在此一并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田 昌 五

1958年1月8日于北京

目 录

前言·····	1
一 王充的生平和他所处的时代·····	1
二 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	29
三 战斗的无神论·····	72
四 社会历史观·····	103
五 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125
六 对孔孟之道和各种书传的批判·····	141
七 余论·····	159
再版后记·····	163

一 王充的生平和他所处的时代

王充是我国古代的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进步的思想家，一位大无畏的战斗的无神论者。他的著作流传到现在的只有一部——《论衡》。这是他的一部最富于战斗性的代表作，是他差不多用毕生的精力写成的。这部著作以论战的形式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神秘主义的和复古主义的思想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批判，针锋相对地建立了唯物主义的无神论的进步的思想体系。王充的《论衡》今天仍然是一部脍炙人口的著作。王充所作的批判工作今天仍然有其不可磨灭的现实意义。

要了解王充和他的《论衡》，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他的生平和他所处的时代，从而找出王充的思想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

王充是东汉时代人，生活在这个朝代的前半叶，差不多经历了光武、明帝、章帝、和帝四朝。《论衡》的末尾有一篇王充的自传，题为《自纪篇》。它是我们了解王充的生平的重要依据。他在其中自称：“王充者，会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建武三年，充生”。建武是东汉光武（刘秀）的年号，建武三年相当公元27年。距现在一千九百四十六年。王充的卒年较难考订，但也并非毫无脉络可寻。他自称：“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

诣扬州，部丹阳、九江、庐江。后入为治中。”“章和二年，罢州家居。”这是王充一生中的最后一次仕进，时在章帝元和三年到章和二年，即公元86—88年，王充这时约六十二岁。关于他的这次仕进，《后汉书·王充传》有类似的记载，唯年代不详。《王充传》载：“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据此，王充自纪中的说法是可信的。在致仕之后，王充就在家中养老，一直到死。不过在死之前，他还写过一部“养性之书”。《王充传》称他“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养性书十六篇”。这部书究在何年著成，《王充传》中没有说明。幸好他在《自纪篇》中给我们提供了一点线索。他自称：“庚辛城际，虽惧终徂，愚犹沛沛，乃作养性之书，凡十六篇。”这就是说，该书成于“庚辛”之际。“庚辛”之际究竟在那一年是不难推算出来的。王充生那一年是丁亥年，后推六十二年到他致仕那年是戊子年，再后推二——三年就是庚寅年和辛卯年。王充这部书必在这两年中著成无疑。这时他已六十五岁了。《王充传》说他“年渐七十”，尚称可信。王充究竟在那一年死的，找不到确切的材料。《王充传》称他“永元中，病卒于家”。永元是东汉和帝的年号，共十六年。上边提到的“庚辛”之际是永元二、三年，即永元初年。既然永元初年王充还在著书，他之死必定在书成之后，因此，《王充传》的记载，还算可靠。那么，王充大概是卒于永元之八、九年了。我们姑确定王充卒于永元九年，即书成后之第六年。这一年是公元97年，王充七十一岁卒，距现在正好一千八百七十六年。

王充究竟代表那个阶级，各家的说法不一。有人认为他代表中小封建主，也有人认为他代表农民。我认为要确定一

个思想家的阶级地位，不仅要考察他的出身和经历，而且要考察他所处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包括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总动向，看其思想体系反映着什么阶级和阶层的利益。王充的家世和经历如何呢？根据他在《自纪篇》中的叙述：

“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孙，几世尝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一岁仓卒国绝，因家焉。以农桑为业。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会世扰乱，恐为怨仇所擒，祖父泛举家檐载，就安会稽，留钱塘县，以贾贩为事，生子二人，长曰蒙，少曰诵。诵即充父。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故蒙、诵在钱塘勇势凌人；末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举家徙处上虞。”

这段坦率的自白很重要。它说明王充的先世不是豪门大族，而是受地方豪族压迫的；他的先世虽一度受封为封建小贵族，但很快就在豪强大姓的蹴迫下没落了。不过我们也绝不能把王充的先世视为一般的农民，因为他的祖上曾经为官，失官之后还有钱买土地，再后还有钱经商，而且能供王充读书。王充的先世的这种社会经济地位就决定了它敢于、而且不得不和豪族对抗。有人认为王充先世的反豪族的传统仅仅是一种“墨侠”或“游侠”的传统，是不够恰当的。当然在分析问题的时候估计到“墨侠”或“游侠”传统的社会影响，固无不可。

我们不妨具体分析一下王充的家庭历史。他的祖先曾因军功受封，无疑即得到过军功爵。军功爵是秦制，共二十级。汉因秦制，没有更改。按照这种制度，凡是为封建国家立下战功的人，都可以受到特殊的赏赐，上者为王侯，下者也可以得

到免役免税的优待。王充的祖先曾因军功受封过一亭之地，汉制“大率十里为亭，亭有长”，也就是说他的祖先曾享有一亭之地的国家租税。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封爵呢？我们引几则汉高帝（刘邦）分封功臣的材料即可明白。

“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汉书·高帝纪》）

“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同上）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曾不为决，甚亡谓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今吾于爵非轻也，吏独安取此！”（同上）

据这几则材料来推断，王充的祖先所受的封爵既非“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也不仅是“复其身及户”或“世世复”，而乃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下乃食邑”。其爵级当在五级至九级之间，很可能是八、九级爵，即公乘或七大夫。这种爵虽然相对地说是“高爵”，但实际并不高，因此才有“甚多高爵”的现象。有这种爵位的人勉强可以“食邑”，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却起不了甚么大作用，最多只能在地方的“令丞亢礼”一下，如此而已。也许王充家中的任侠传统就是受了其祖上的这种武功的影响。

王充的祖上究竟在何时受封、何时“国除”的，我们不得而知。据估计其受封可能在西汉中叶的武、宣之际，而其“国除”当在西汉后叶，其间时间不会太长。因为起码在他曾祖父时，王充家已弃官为农，即“以农桑为业”了。而他祖父的迁居是

在“会世扰乱”之际，当系新莽之前。随着王充祖上的弃官为农，其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必然随之下降，而受到了地方豪族的侵凌。我们看他祖上迁居的原因，第二次是由于和“豪家”结了仇，第一次是由于“恐为怨仇所擒”。这种“怨仇”绝非一般的老百姓，而应是地方豪族。因为象这种曾经立过军功、并和“令丞亢礼”的后裔，除了地方豪族，一般老百姓那敢欺侮他们呢？

随着第一次迁居，王充家里进一步衰败下来。这表现在他祖父的弃农从商上面。也就是说，在豪族的侵逼下，王充的祖父丧失了自己的土地，转而经营小商业了。因此，他称自己的祖父“檐载”而逃，当不是太夸张的说法。但是在第一次迁居之后，他家并没找到一片安乐的地方。在钱塘县，他家又受到豪族的欺凌，而且和“豪家丁伯”结了仇。结果，他父亲被迫再次迁居，逃到了上虞县。

在逃到上虞县后，他家可能继续经营小商业。但是随着第二次迁居，家道一定更不如以前了。因此王充虽能勉强读书，并到京师洛阳游学，但由于家贫买不起书，他在洛阳时不得不到书市中站着看书。《王充传》说他“家贫无书，尝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可见，王充所以能成为当代的大学者，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天才，而更重要的是由苦学而成的。

综上所述，王充的家庭出身的确是象他自己所说的“细族孤门”（《自纪篇》），“细族”当然是对豪族而言，“孤门”就是没有什么族党可以凭借。可以说，王充出身于一个破落小贵族转而经营小商业的家庭，正逐渐落入劳动人民的队伍里，因

而他家才有反抗压迫的传统“任侠”精神。这一切不能不对王充的性格产生深刻的影响。

的确，王充是继承了这种反压迫精神的。因此，他虽然学识渊博，是当时思想界的先进人物，却一生不得行其志。

据王充自称，他自幼很聪明，六岁开始读书识字，八岁到书馆读书，品德和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因此，他后来被保送到京师太学深造，“师事扶风班彪”（《王充传》）。但他却不拘守一家之言和章句之末节，而是博览强记，精通“众流百家之言”。也许正是这种学习精神和自己的学术见解与班彪不合，所以他很快就离开班彪，独立地进行研究了。这大概就是他在《自纪篇》中根本不提班彪的原因吧！游学洛阳对王充之成为一个思想上的巨人，是一个极重要的关键。可是好景不常，王充不久就由洛阳回到他的故乡去了。为什么王充不能长期留在洛阳进行研究呢？看来主要的原因是经济困难，而又得不到任何仕进的途径。

王充一生中也作过几次小官，但都系幕僚性质，没有什么实权，并且往往因意见不被采纳而自动去职，所以每次仕进都为时很短。他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著书立说，“屏居教授”。他自称：

“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为从事。”（《自纪篇》）

他的职位最高的是“入州，为从事”，“转治中”，最低的是为县府小吏，一般都是清闲的差事。“掾”是普通的政府随员，职务不定。“功曹”大概是考核政绩的官。“从事”不过是协助州郡进行一些视察罢了。但是王充做事却并不马虎，而当他

的意见不见用的时候，他宁可弃官回家。例如章帝建初年间他在郡中做官时，因为发生了天灾，他就建议郡守下令“禁民酒”、“禁奢侈”（《对作篇》），结果都不见用。就是因为这个原故，他就自动辞职了。《后汉书·王充传》称：

“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

他在州中做官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情况。他自称为了作监察工作，不得不把研究学问的事搁在一边，说是“材小任大，职在刺割，笔札之思，历年寝废”（《自纪篇》）。不言而喻，王充这样努力去“刺割”定会触怒不少权贵人物，因而必然受到打击和排斥，不得不“自免还家”。

由此可见，王充所以终身仕路不通，不仅是由于他出身寒门，无所凭借；而且是由于他对当时的恶劣社会风气的不妥协态度、他的不避权贵的精神以及他对封建正统思想的批判精神。但是，他的遭遇并没有得到社会舆论的同情。相反地，他却因此受到了种种嘲笑与冷遇。有些在他作官时追随过他的趋炎附势之徒这时都离开了他。更有些人污蔑他是无材和低能、玩忽职守等等。他在《自纪篇》中很沉痛地说道：

“俗性贪进忽退，收成弃败。充升擢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故旧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闲居作讥俗节义十二篇。”

“充仕数不耦，而徒著书自纪。或亏曰：所贵鸿材者，仕宦耦合，身容说纳，事得功立，故为高也。今吾子涉世落魄，仕数黜斥，材未练于事，力未尽于职，故徒幽思属文，著记美言，何补于身？众多欲以何趋乎？”

然而难能可贵的是：王充并不把这一切放在心上。他不

计较个人的旁通利达，而锐意于追求真理，广泛地阅读各种著作，并专心著述。这种酷爱真理的精神一直贯穿着王充的一生。他很自豪地说：

“见污伤不肯自明，位不进亦不怀恨。贫无一亩庇身，志佚于王公；贱无斗石之秩，意若食万钟。得官不欣，失位不恨；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淫读古文，甘闻异言；世书俗说，多所不安；幽处独居，考论实虚。”（《自纪篇》）

但是，王充的著述活动照样受到社会舆论的非难。人们声称，他既非出身于书香门第，又没投靠名师，所以就不配著书立说。因此，他的学说一出世，就被视为异端邪说、被当作妖怪。反动统治阶级一开始就想扑灭它，扑灭不了就干脆把它封锢起来。这样，王充除了受到生活的压迫外，还要受到精神的压迫。如果没有献身真理的决心和毅力，他压根就是无法进行著述活动的。请看王充所受的精神压迫吧！

“充细族孤门。或嘲之曰：宗祖无淑懿之基，文墨无篇籍之遗，虽著鸿丽之论，无所禀阶，终不为高。夫气无渐而卒至曰变，物无类而妄生曰异，不常有而忽见曰妖，诡于众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载；况未尝履墨涂，出儒门，吐论数千万言，宜为妖变；安得宝斯文而多贤？”（同上）

王充晚年的生活更为惨澹，作官早已是此路不通了，他根本也断绝了这个念头；教书和著述活动恐怕也因年老而无法继续下去了，只有呆在家中默默地等待死神的降临。然而当时的社会却不让王充有一个愉快的晚年。因为年老没有依靠，他连生活都发生问题了。所以，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当他提到他的晚年生活的时候，不能不流露出无限的悲

愤。他说：

“年渐七十，时可悬舆；仕路隔绝，志穷无如；事有然否，身有利害；发白齿落，日月逾迈；俦伦弥索，鲜所恃赖；贫无供养，志不娱快。”（《自纪篇》）

综上所述，王充在一生中虽作过几次无关紧要的官职，但并没有落到统治集团里去，要这样也不可能。他的一生是一个贫困的知识分子的一生，是始终失意的一生，是为了追求真理而备受打击的一生，真是多灾多难啊！这种遭遇不能不在王充的思想上打上深刻的烙印。

但是，家庭出身和个人遭遇虽能对一个人的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一个人的思想却不是完全地、并且主要地不是由他的家庭出身和个人遭遇所决定的。更重要的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思想的发展，是贯穿在各种社会领域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同时，家庭和个人作为社会的一个细胞，必然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所制约、所规定，处在特定的阶级关系中，给其思想打上阶级的烙印。王充的家世和遭遇，同样为当时的社会阶级变动所决定，并反映着当时的社会阶级变动的趋向。现在，我们就来简单地追溯一下汉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 and 阶级关系。

马克思指出：“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须把它当做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否定的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①所谓坏的、否

^①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4—155页。